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 17ZDA290) 的子课题“国际传播的视觉修辞原理、
机制与路径”



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应用
精·品·教·材·译·丛

数字新闻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荷] 塔玛拉·维茨格 (Tamara Witschge)

[美] C. W. 安德森 (C. W. Anderson)

[比] 戴维·多明戈 (David Domingo)

[加] 阿尔弗雷德·贺米达 (Alfred Hermida)

编著

高丽 姚志文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amara Witschge, C. W. Anderson, David Domingo, Alfred Hermida

EISBN: 978-1-4739-0653-2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Introductions & editorial arrangement © Tamara Witschge, C. W. Anderson, David Domingo and Alfred Hermida 2016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SAGE Publications, Inc. 授权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4655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 010-62782989, 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新闻 / (荷) 塔玛拉·维茨格(Tamara Witschge) 等编著; 高丽, 姚志文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1

(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应用精品教材译丛)

书名原文: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ISBN 978-7-302-55610-7

I. ①数… II. ①塔… ②高… ③姚… III. ①数字技术—应用—新闻工作—教材 IV. ①G2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0928号

责任编辑: 陈 莉 高 岫

封面设计: 周晓亮

版式设计: 方加青

责任校对: 马遥遥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富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260mm 印 张: 21.75 字 数: 728千字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产品编号: 073648-01

编委会

主任：林如鹏 暨南大学

主编：支庭荣 暨南大学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李 彪 中国人民大学

李良荣 复旦大学

刘 涛 暨南大学

陆 地 北京大学

谢耘耕 上海交通大学

沈 阳 清华大学

张志安 中山大学

钟 瑛 华中科技大学

祝建华 香港城市大学

这是一个新兴媒体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二十多年，见证了网络社会的异军突起。“互联网+”计划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新媒体的增长空间。截至2015年6月，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趋近50%，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七成。作为对比，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保持在六成以上，从理论上说，如果电视机全部消失，对城市的影响已不太大，尽管还是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乡村地区的收视需求；同样，如果报纸全部消失，对大部分读报人口来说影响也不太大，尽管其阅读体验可能会下降不少。互联网和手机对于传统报纸和电视的替代性，越来越强。只要有手机在，没有报纸的日子并非难以忍受；只要有电脑、平板电脑和互联网，没有大屏幕彩电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的迷恋，甚至已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症候”。新媒体，正在成为人体的新延伸。

曾几何时，世界上最大的免费物品是空气和阳光，如今可能就要数互联网上的信息了。网络信息的市场均衡价格，近乎为零。免费带动付费，以至于数字经济蓬勃生长。专业机构和众包生产参差不齐的内容，一起被投进了免费的染缸，难分彼此。在报纸的黄金时代，读者挑错的来电来函络绎不绝。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对低劣信息的容忍度却增加了，见猎心喜，愿意忍受免费、新奇而营养价值或许不高的内容。互联网和整个新媒体家族，作为巨大的分布式的数据生产、复制工厂和推送、分享空间，具有一种吞噬性的力量。几乎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迅速数字化。这样一种近乎“黑洞”般的传播能力，使得任何单体的模拟制式的传播者黯然失

色。新媒体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内容、娱乐和各种各样的应用市场。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互联网和新媒体世界的控制力，掌握在技术取向的大型平台和超级运营商的手中，这些大型平台和超级运营商，如谷歌、苹果、百度、腾讯、阿里等，逐渐囊括了信息聚合、信息储存、信息搜索、社交娱乐、地理位置服务、数据挖掘、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环信息经济圈。新闻，只是它们的副业之一。

技术相对于内容的霸权，在目前这一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升级的阶段是相当明显的。但是，人类社会终究由人们的认知、心态、想法、观念所主导，而非技术的奴隶。移动终端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优越感和幸福感而已。好的内容，优质的新闻产品，始终有它的独特价值，并且能够在技术标准逐渐成熟后，再一次恢复自己的崇高声望。因此，技术不可或缺，内容也依然重要。计算机科学技术不等于新媒体的全部，新媒体传播的理论和应用，仍有许多独特的规律等待人们去探求。

新传播技术正在并还将创造出很多种可能。看起来，新媒体传播与传统新闻工作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取决于一个个睿智头脑的即时生产，标准化作业即使有，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语言的隔阂、用户的地缘兴趣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决定了行业的规模边界。但是，机器人对人工操作的取代，在财经、天气等领域已初显身手。智能化技术将会解决很大一部分初级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问题。技术的含量，与内容、产品、营销等类目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需要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

与此同时，新媒体传播的理论和应用，

也对深化和拓展传统新闻传播学的地盘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互联网的出现承接、替代了媒体的功能，而不是媒体创造了网络。媒体是网络时代的追随者，是数字革命的后知后觉者，媒体恐怕做不到掌控网络的命运。互联网为各种各样的企业提供底层平台，也推动了商业、教育、娱乐和新闻信息等应用平台的成长。具有强大商业能力、创新能力的企业，乃是网络时代的弄潮儿。当媒体汇入了互联网的洪流中，意味着新闻业的变革成为必然。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回应，新媒体传播学科

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需。

当然，人们不应忘记，往往渠道越发过剩，数据越发富集，信息越发泛滥，优秀的产品始终稀缺。这是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和命脉所在。

鉴于时代的新变化和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我们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又一次携手合作，瞄准世界前沿，组织了一套“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应用精品教材译丛”，以飨国内的读者。前路漫漫而修远，求索正未有穷期。

支庭荣

前言

Tamara Witschge, C. W. Anderson,
David Domingo, Alfred Hermida

学科的问题

同类书籍通常为读者提供一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查考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及考察它的历史与未来。这些手册被解读为与这门学科紧密相关的权威读物。本书读者将会知晓那些围绕着新闻业的历史与未来而展开的诸多讨论(Downie, Schudson, 2009; Lee-Wright 等, 2012; Peters, Broersma, 2013; Anderson 等, 2012), 以及相关的新闻学研究(Zelizer, 2004; Boczkowski, Anderson, 2016)。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帮助学者们反思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路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推进未来的新闻研究与理论的发展。

同时，我们不想让本书扮演图书这样的“角色”，即对新闻研究和这门学科当前面临的种种议题的权威性描述。我们是否可以把新闻研究视为一门学科(或者把数字新闻研究视为一门子学科)，这并不是本书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本书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审视21世纪新闻业的新方法，而非仅仅探察这一领域的边界。我们将研究这个领域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说与其他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本书可视为一份请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领域及其方法和理论的邀约。早在2000年，芭比·泽利泽尔就注意到，确实有必要“构建一个更为综合、广泛的新闻学术体系……以推动新闻研究沿着一条全新的路径发展”(Zelizer, 2000)。15年后，我们仍然认为这是当前该领域最为迫切的需求之一。同时，本书的各个章节展示了学者们进

行新闻研究可借鉴的、丰富的视角，也是邀请读者们思考和发展出洞察和分析的新方法。确切地说，我们希望这本书被“使用”而非仅仅被“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各个章节是以鼓励读者进行实际应用为目的的。

除了提倡新的视角和方法以外，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汇集多方的声音且提供偶尔出现在不同章节(有时是同一章节里)的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发现、观点等。应该明确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正相反，我们的立场是，我们需要离开新闻研究中已经达成一致的对新闻的同一化理解，朝向对新闻和新闻业的一个更为多元的理解。差异、分歧和多元是本书的核心主题。这个趋势正在发生，不仅在学术领域里，也在学者们视为研究对象的现实世界中。如果读者们能从这本书中领悟到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数字新闻中的“数字”

虽然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出数字新闻研究的一门子学科，但其标题中确实含有“数字”一词。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崛起(以及对新闻业和新闻研究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本书的中心。其中相互补充的章节解释了，当我们想要探索和分析数字新闻的时候，需要说明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和新的实践，需要重新思考理论和发展出研究策略。我们并不希望暗示的是，在数字技术被引入以前，新闻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和一种稳定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并不关心这些议题，不比较传统新闻和数字新闻，以及传统新闻业和数字新闻业之间的异同，也

不会建立相关的因果关系。数字环境被看作一个给定的事实，对于本书编撰者或者参与者，传统新闻业的功能并非提供“比较基准”。

本书展示了新闻环境与实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非在传统新闻业和未来新闻业、主流新闻和另类新闻以及数字新闻和非数字新闻(或前数字新闻)之间划清界限。过去几十年里，在新闻领域发生的根本变化不能轻易被归因于一个因素，不管这个因素是技术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发生在这个领域的种种趋势也并非指向新闻实践的某一个方向，因而新闻研究也不是只有一条路径。为了使我们的研究领域被公正地看待，我们需要和研究对象一样复杂的理论与方法(见第36章)，以及包含了这个领域的分散性和混杂性的理论与方法(见第11章)。

已经发生在这个领域的诸多变化不能被简单地精炼为技术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数字”这一说法有可能具有误导性。在本书中，我们使用“数字”作为一个“捷径”来指涉当代新闻领域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体。不容否认的是，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崛起引发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局限于新闻领域，也发生在社会层面。

本书结构

第I部分讨论的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解释那些与新闻有关的、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领域；提出民主、权力、代理、金钱和伦理的问题。始终贯穿该部分内容的中心思想是：在一个混合的、有各种参与者在场的数字媒体环境中，我们如何就新闻业的那些根本方面提出问题、开展讨论，或者如何强化这些方面。被囊括在第I部分中的章节共同勾勒出了数字新闻的图景，凸显了这个领域里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为了理解当代环境的复杂性，第I部分的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以及对局部情况的敏感体察，以此把变化的机制、因素和过程置于职业、产业和社会演化的背景当中。

第II部分的主题是“数字时代的新闻实

践”。这一部分的各个章节并非仅仅识别和区分生产实践与消费实践，而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这一复杂性给研究者们带来的种种挑战。位于挑战中心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趋势：新闻业的分散化(Ringoot, Utard, 2005)与混杂化(Chadwick, 2013)。这两个趋势不仅促使新闻语境、新闻实践和新闻从业者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也许更为根本的是，这种差异化在现如今的数字化环境中还不是很清晰，这已经被描述为一种“混淆疆界”的现象(Carlson, Lewis, 2015)。第II部分中的各个章节探索的是人们以观众、使用者、生产者、消息提供者、专家或市民等身份接触新闻的不同方式。每一章节以特有的方式对现有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且针对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实践给出了全新的概念。

第III、IV部分各自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理论和方法是如何回应上述这些挑战的，以及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发生在新闻这个领域的种种变化。在解释复杂性上，我们提倡的不是用僵硬的模型去处理田野调查，而是需要能够描绘出多样性和混杂性的理论和方法工具。我们需要研究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定义他们与新闻的关系，他们如何通过互动来形塑新闻生产，以及让新闻业发展演进和拒绝变化的因素是什么。第III部分聚焦“新闻业的概念化”，提供种种有时互补、有时矛盾的方法，将“新闻”概念化为实践、机构、领域、网络或生态系统。这部分内容还提供新闻业中关键行动者的新概念，包括记者、公众、空间和技术。

最后，第IV部分的各章节为读者提供“研究策略”。它们回顾了可用的方法论工具，并且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现有的方法是如何帮助我们解释这个领域中学者们所面临的挑战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方法中的每一个都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它们说明变化着的生产与消费实践；它们提供对访问和存取“大数据”的深刻理解，以及抽样、分析与当前新闻业一样易变的事物的方法。这些章节提倡这样的方法和研究策略：使新闻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质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涉及强调新闻工作

的物质层面的视角、民族志、重构采访、Q-方法和三角测量)。

那么新闻研究的下一步是什么呢？这本书的各个篇章是如何说明这个问题的？如上所述，这本书并没有遵循某个被一致认同的范式，也不是为了得出这样的一个范式。很有可能的是，这本书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新的疑问，而非已有的疑问被解答。在阅读目录时读者会感受到很多张力。这些张力不会缓和，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在读者阅读具体内容的时候会变得更为剧烈。这本书囊括了这个领域的复杂性以及张力和不确定性。

和第37章的作者Costera Meijer一起，我们

呼吁在新闻研究领域有更大的空间容纳怀疑、矛盾和混乱。对于我们，这意味着一个学科的成熟：能够与未知共存，而不是要知晓一切；寻找和包容灰色地带，而不是熟练地限制研究对象；为很多有可能矛盾的关于什么是新闻和什么是记者的定义创造空间；以及承认新闻能以很多方式影响社会，远远不止其在西方社会里的民主角色(Zelizer, 2013)。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为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添砖加瓦。对我们而言，这本书展示了方法的多样性，而正是这一多样性使得这个研究领域如此令人着迷和包罗万象。

编者

目 录

第 I 部分 不断变化的环境	1
第 1 章 数字新闻与民主	3
引言	3
批评新闻与民主范式的理由	4
沟通式民主的不同模型	6
新闻的不同概念	7
谁在做新闻	8
得与失	10
不同新闻形式的融合	12
第 2 章 全球媒体权力	13
传统媒体权力	13
新媒体生态系统	14
新媒体力量	17
结论	19
第 3 章 数字化新闻媒体与少数族裔	20
对少数族裔观众的约束	21
少数族裔的新闻实践：动员逆流与弥合差距	24
结论	28
第 4 章 新闻业务	29
我们所了解的新闻业务	30
越来越数字化的新闻业务	33
新闻业务的未来	37
结论	39
第 5 章 数字新闻伦理	41
媒体伦理的起源	41
重点问题	42
功能概念	43
认知概念	45
结构概念	47
批判概念	49
总结	50
第 6 章 社交媒体和新闻	51
定义社交媒体	51
新闻环境	52
新闻的背景	54
新闻实践	55
总结	57
第 7 章 网络框架与把关	59
引言	59
媒体控制理论：把关与框架	60
网络把关：一种以人群为中心的理论	62
网络框架：一种以人群为中心的理论	65
结论	67
第 8 章 新闻的亲密化	68
引言	68
社交媒体和新闻消费	69
社交媒体中的新闻工作者	70
前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与亲密性	72
公众新闻工作者的衰落	74
第 9 章 情绪与新闻	78
引言	78
新闻与情绪：有问题的结合	79
数字新闻与情绪：追踪“数字颠覆”的后果	81

受众参与与真实性	82
结论	86

第II部分 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 ··· 87

第10章 网络新闻业 ····· 89

引言	89
记者和公众的关系变化	90
参与与控制的张力	92
数据驱动的实践	93
网络公共领域	95
新闻研究的未来	96

第11章 融合新闻实践 ····· 97

反对对立	97
整合与语境	99
社会形态与功用的融合：媒体介入	99
技术与形式的融合：社会目击	101
新闻与营销融合：重视真实	102
结论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104

第12章 新闻参与的生态 ····· 105

引言	105
“生产”内容	106
沉默的大多数	108
情感和社区作为参与的驱动因素	108
参与的生态	110

第13章 新闻编辑室里的创新 ··· 112

新闻编辑室的创造性破坏	112
一种商谈过程	113
影响新闻编辑室创新的因素	114
结论	119

第14章 外包新闻工作 ····· 121

引言	121
外包：划定界限	122
外包：产业结构和劳动条件	123
外包和工作实践	124
外包与技术	126
规范影响和结论	126

第15章 半专业记者 ····· 129

认同危机：命名参与性	129
活动和创造力：实践和动机并行	131
反应性：信息提供者，从消息来源到新闻资源	132
互动性：接入、工具和UGC专业平台	133
社区商品	135
UGC的失衡与矛盾	135

第16章 作为新闻生产者的消息来源 ····· 137

大众传媒时代的消息来源	138
重思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来源	140
是多元公共领域，还是基本认同的新时代	143
结论：构想新闻文本之外的新闻来源	144

第17章 作为新闻生产者的行动者 ····· 145

在线动员与权力结构的强化	146
连接型行动的兴起	147
抗议渠道	148
数字监督：监测和披露政治信息	149
媒介接触的终极解释	150
激进主义与新闻的多步骤模型	151
讨论和结束语	152

第18章 公民目击 ····· 153

引言	153
作为专业理念的目击	153
媒体目击	155
作为远距离苦难的视觉表征	156
专业目击与公民目击	158
结论	160

第19章 超本地新闻 ····· 161

定义超本地新闻	161
我们对超本地新闻的了解	163
超本地新闻的可持续性：公司专营与独立经营	165

超本地新闻理论	167	人类—技术维度的概念化	199
结论	168	新闻业及其社会行动者	200
第III部分 新闻业的概念化	170	新闻业及其技术行动元	201
第20章 数字新闻的规范性		技术依赖的概念化	202
模型	173	结论	203
引言	173	注释	204
参与性	174	第24章 新闻消费的空间和	
去机构化	176	地点	205
创新	178	引言	205
企业家精神	180	从大众媒体消费到数字媒体实践	206
结论	181	对新闻受众的空间的概念化	208
第21章 大众、受众和公众	182	数字消费场所——家庭、工作、公共和	
引言	182	虚拟空间	211
文化受众研究和新闻	183	结论	213
公众	184	致谢	213
受众	185	注释	213
大众	186	第25章 新闻制度	214
结论	187	身份和规则	214
注释	188	持续性	217
第22章 作为实践的数字新闻	189	改变	219
引言	189	结论	221
实践理论	189	第26章 新闻场域	223
引入作为实践的分​​享	191	引言	223
Twitter: 一个分享信息、新闻与评论的		场域隐喻	223
平台	192	解释, 场域和个人	226
精英们的Twitter实践	193	新闻的权力	227
政治激进分子的Twitter实践	194	新闻场域的变化	229
新闻工作者的Twitter实践	194	结论	231
紧张和矛盾	195	第27章 新闻网络	232
结论: 共享和新闻业的未来	197	打开新闻编辑室的黑箱: 理解技术	
注释	197	创新	232
第23章 描绘新闻业中的人机		追踪新闻编辑室以外的网络: 新闻实践	
差异	198	的多元性	235
引言	198	新闻业的(再)建构: ANT, 权力与	
		规范性	237
		结论: 调和	239
		注释	240

第 28 章 新闻生态系统	241	第 32 章 通过访谈重构生产 实践	280
引言	241	引言	280
新闻编辑室内外	241	基础预设	280
关于新闻生态系统的思考：简短的溯源 考察	243	重构访谈与传统方法	281
两种媒体生态	243	需要考虑的因素	283
媒介生态学与数字新闻学研究	246	优势和局限性	287
结论	249	第 33 章 对液态新闻进行抽样	289
注释	249	引言	289
第 29 章 流动的新闻业	250	液态新闻抽样面临的挑战	290
从稳固性职业到流动性职业	251	获取社交媒体数据	292
改变的困难：管理者遇到“自命 不凡者”	254	变量设计与计算机编码	294
专业力量的利益	257	结论	296
未来：协商身份	259	第 34 章 大数据分析	298
第 IV 部分 研究策略	261	引言：新闻学中的大数据	298
第 30 章 数字新闻生产的民族 志研究	263	新闻生产中的大数据	299
引言	263	关于新闻接受的“大数据”	301
民族志研究简史	264	机会和威胁	304
早期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方法的 发展	265	新闻研究中的“大数据”应走向何方	306
新闻民族志研究中的“感性”	266	致谢	306
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中的“感性”	267	第 35 章 Q-方法与新闻受众 研究	307
数字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研究技术	268	在新闻中度过生命里的一天	307
考虑、限制和结论	269	融合媒介文化中作为新闻受众的 公民消费者	308
第 31 章 在新闻研究中采用“物质 敏感性”	271	新方法、创新方法与传统方法	308
什么是物质性，为什么它对新闻研究 很重要	271	以用户为出发点：非媒体中心，跨媒体 视角	309
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超越	272	洞察力互补的混合方法	310
方法论困境	273	描绘新闻消费的跨媒体景观：探索用户 的媒体使用情况	310
方法论线索	275	整合跨国和纵向视角分析新闻汇辑	314
新闻研究的物质时代即将来临	279	结论：混合方法的附加值	315

**第 36 章 实践以受众为中心的新闻
研究 316**

数字时代主流受众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	317
必要的多样性：开放新闻研究的 研究议程	319
新闻伦理中的用户视角	322
结论	324

第 37 章 多重方法研究 325

简介	325
新闻研究中的“方法工具包”	326
模态内与模态间的多方法研究设计 ...	327
多方法设计的功能和结构方面	328
多方法设计的挑战	330
结论与展望	330

不断变化的环境

Alfred Hermida

鉴于数字新闻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领域，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勾勒出这个领域的大致轮廓，并力图识别出与那些老生常谈的路径不一样的方向。理解数字新闻的第一步是绘制出新闻与信息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这部分的各个篇章考虑、评估和质询的是：什么条件致使新闻在社会中的位置不断演化和突变。

前三个章节关心的是数字环境中新闻与基本的权力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相关变化的方法。这些章节共有的一个主题是：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是如何通过数字媒体被重新配置、固化和改造的。第1章的作者Beate Josephi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在民主社会运行中新闻被假定了什么角色。这一章节重点关注：使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和新闻生产过程民主化成为可能的数字化技术，如何引发了新闻领域专业化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张力。核心的问题是：视自身为民主“台柱子”的制度化的新闻是如何与数字新闻的多视角的潜能结为同盟的。

第2章的作者Taylor Owen将“对抗的当局”作为其讨论的主题，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数字媒体权力的新形式如何挑战制度化的新闻？这一章记录了非制度化行动者(比如维基百科)和本土化的地方新闻运作(比如Kigali的出现)，同时还有来自冲突地区(比如叙利亚)的去中心化的目击者与报道的崛起。诸如此类的发展挑战了国际报道的海外通讯员模式与制度化媒体所给出的关于新闻的定义。他们还指向这样的必要性：更好地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这些因素呈现出权力的迁移。

第3章的作者Eugenia Siapera在该章中提到

了发声、权力和表征的议题。它关注的是把少数民族作为单一实体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基于把种族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概念化。和欧文一样的是，Siapera也关注数字媒体权力的问题，表现在少数民族开始成为内容的生产者，这极大便利了信息、动员和跨接的逆流。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研究新闻的一些基础是如何被挑战、削弱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被根本性地破坏的。这部分讨论新闻的商业运作、新闻伦理和新闻与受众的关系。对很多在新闻产业工作的人而言，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为专业化的新闻素材收集、新闻内容生产和新闻传播提供充足的资金。第4章的作者Rasmus Kleis Nielsen深入地剖析了数字媒体如何破坏传统新闻商业模式的关键要素。处于商业挑战核心的是这样一个悖论：所谓的能让读者从中受益的来自更多信源的更多的新闻与新闻产业的财务健康是相矛盾的。该章节指出，在混杂的媒体环境中，以营利为目的的新闻角色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数字媒体同样在动摇传统的规范与价值。第5章的作者Stephen Ward并没有维护那些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经定义了什么是专业新闻的种种方法，也没有试图拯救传统的新闻伦理，而是让新闻伦理重生以顾及数字媒体的影响。该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包容性、诠释性和全球性的数字媒体伦理视角，此视角能够成为数字媒体空间中专业记者和其他行动者负责任传播的基础。

作为第6章的作者，我关注的是专业记者宣称的在新闻收集、生产和散播上的权限所面临的来自这些新兴行动者的挑战。该章对社交媒

体和专业新闻之间的互动作出评定，并指出社交媒体如何成为制度化媒体之外的空间，供公众消费、分享、监督和质疑专业记者的工作。该章还强调了随着数字媒体成为一个混杂、矛盾的意义建构场，新闻工作如何在新闻制度的逻辑之外展开，尽管新闻仍由专业媒体价值所塑造和改造。

基于前面章节的论述，第7章到第9章深入分析了一个网络化的、协作的媒体环境对新闻工作的影响。第7章的作者Sharon Meraz和Zizi Papacharissi聚焦“网络把关”和“网络框架”的概念，以此强调参与者、观点和议题是如何通过参与式的社会架构而浮出水面的。他们指出新闻的把关和建构功能如何被重新相互贯连，如何塑造谁是说话者和说话对象，以及如何影响信息的过滤与传递。其结果是对新闻叙事进行一种动态的、非固定的矫正。

第8章的作者Steen Stensen讨论的是记者在这样一个共享的、混杂的媒体空间中的位置。他的论述聚焦社交媒体环境以及该环境如何与新闻的公共性互动。具体来讲，该章以一种历史的视角着眼于记者如何在私人角色和专业角

色之间取得平衡，并且提出社交媒体导致新闻工作“幕后领域公开化”的趋势。

记者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更加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新闻叙事形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正如第9章的作者Karin Wahl-Jorgensen所解释的，情感在新闻中的角色并非人们第一眼看上去觉察到的那么新奇。相反，她从公民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角度出发回溯了新闻中情感表达的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随着用于情感表达的新空间的开放，新闻业朝着更个人化、更主观的叙事的变化趋势。

然而，正如第I部分的各章节提及的其他趋势一样，这样的变化被一些记者接受，也被其他记者排斥。新闻领域正在被重新配置，记者们的工作环境也正经历着同样的过程。数字新闻的世界是令人吃惊和不安的，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第I部分的各章节旨在充当本书的一个“发射台”，为后面关于新闻领域里夺人眼球的新规范、新实践、新角色、新理论和新概念的讨论、分析及解释做背景和语境上的铺垫。

数字新闻与民主

Beate Josephi

引言

数字新闻的出现并非无源可溯。它得益于技术上的种种可能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新闻的面貌，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尤其如此。全球范围内，传统新闻业仍然占据支配地位，正因为如此，数字新闻被看成是与传统新闻的协作而不是隔离。

在与民主的关系定义上，数字新闻不同于传统新闻。技术上的种种变化为能够和愿意积极参与新闻生产、传播的人们开放了渠道，这个角色以前局限于专业记者和媒体机构，现在让新闻过程更加民主化。本章节旨在解释有关新闻和民主的各种见解，并且考察参与的新可能性是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数字新闻领域的进展有目共睹，由此带来的利弊得失也是能够被评估的。

除了对新闻与民主做全面的概述，本章还总结了新闻领域各种各样的趋势、数字鸿沟以及民主概念在人们头脑中散布的不均衡状况。鉴于新闻与民主的开端始于西方国家，而且如今新闻领域里的快速变革也发生在西方国家，把讨论的范畴局限在这个区域确实比较容易，但描绘出的新闻业的图景却是不完整的。

新闻与民主

作为民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的概念，在20世纪里被明确地给予了表述和解释。但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媒体和朝向民主的努力二者之间关系的开始则始于17世纪，当时意识形态的斗争初现端倪于出版业。为了把出版业从国家和宗教权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诗人John

Milton(约翰·弥尔顿)要求政府给予未经批准的印刷以自由(1644)。他在议会上的这次演讲随后被出版成册，标题为《论出版自由》，直到今天仍然是为言论自由而战的重要文献之一。让Milton深信不疑的是，如果所有“教条的风被散落在地上”，真理就会胜出。

随着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崛起和有读写能力的公众的增加，出版成为不同政治需求相互竞争、公开讨论的“广场”。直至今日，促进有见地的意见交流已经成为新闻最有影响力的视野之一。它为如下观点提供了根据，即“新闻是一个协商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信息来源”(McNair, 2009)。

大概三百年后，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和它的一份题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对新闻与民主做了精英主义式的诠释。这个委员会成立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这份报告，旨在阐明新闻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方面(Bates, 1995)。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受到当时欧洲极权主义经验的影响，其中饱含对大众治理与普通市民的深度怀疑。在当时的精英主义者看来，普通市民是信息闭塞的、情绪化的，以及容易被煽动者和宣传所劝服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竞争的环境中，高质量的新闻机构和它们的记者们很容易把自己推荐为公众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在公众意见和政府官员之间充当调解者的角色。媒体把自己呈现为可信赖的信息渠道，以及具有对民主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的告知与把关功能。媒体要提供“在一个赋予新闻事件意义的环境中，对新闻事件真实的、全面的

和明智的描述”(Hutchins Commission Report, 1974)。记者应把自己视为专家, 尽管那些不大受到尊敬的民粹主义媒体谴责这一变化是非民主的(Bates, 1995)。

之后出现的很多学术批评指向记者和编辑们从他们的专有角色出发而做出的实践与选择。在数字新闻的影响下, 以下这两方的争论再一次赫然出现, 这两方分别是支持专业记者为社会上更多人发声的一方和支持以个人为中心的方式理解民主进程的一方(Curran, 1997)。

新闻与民主范式如此普遍的原因

新闻与民主范式如此普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在新闻规范理论中的显著地位, 其中以Fred S. Sieber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这本书的说服力在于对二分法的简单易解——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这是新闻规范理论的基础(Josephi, 2005)。《报刊的四种理论》用新闻和国家的关系来衡量媒体系统, 这是一个让那些民主国家获得特权的活动的, 在这些地方, 新闻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根据独立于政府的程度, 所有的媒体系统被置于从自由主义到极权主义这条线上的某一个点。《报刊的四种理论》成为无数后续研究的试金石, 也是那些揭露其缺点的研究的试金石(Christians等, 2009; Hallin, Mancini, 2004; Nerone, 1995)。

时至今日, 这个范式在新闻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因为西方学术界——尤其在美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对民主的假定”(Zelizer, 2013)。对民主的讨论不大可能会消失, 正如Zelizer所写的, 它的规范性价值已经赋予其“道德上的通行证”(Zelizer, 2013)。数字新闻的参与性又一次激活了对民主模式的讨论, 尤其是对参与式民主模式的讨论。

总的来说, 民主的中心地位正在衰退。一个针对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的综合分析发现, “民主”作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从2000至2006年间的第四位跌落至2007至2013年间的第九位(Steensen, Ahva, 2015)。短语“公共领域”和

“公民新闻”取代了“民主”的地位, 这表明对新闻的理论认知发生了变化, 新闻不再那么受制于某一具体的政府形式。

批评新闻与民主范式的理由

一个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范式

新闻和民主之间关联的历史倾向于以目的论的方式讲述, 以言论自由作为其叙事框架。John Milton在1644年作出的充满激情的辩护远远早于英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时间。伏尔泰, 另一个言论自由的杰出战士, 死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1年前。

新闻与民主范式在美国被理解为是: 由市场资助的媒体独立于政府。如Nerone所指出的(2013), 在美国, 确保该范式合法性的一系列观点最多只存在了几十年。只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个被Hallin称为“盛期现代主义”的时期(1994), 媒体在新闻服务领域才占据垄断地位, 这可以被视作一种权力地位, 而正是这种权力地位支持着当时的媒体人把自己称为社会中的“第四阶层”。这个具有支配性的范式依赖于一个有利的商业氛围, 例如广告业的兴盛和物料成本、运输成本的降低。用Hallin的话来说, 美国新闻界的盛期现代主义是这样时代: “记者变得强大、富有、独立、无私和有公德心, 得到从权力部门到普通市民和消费者的所有人的信任和爱戴, 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可能的。”(Hallin, 1994)

政治共识和经济安全是这个看上去田园诗歌般的世界存在的前提。Hallin判定政治共识的衰退是盛期现代主义的终结。但是直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导致盛期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出现衰退, 我们才看到媒体和记者在选择、呈现和诠释新闻上具有的霸权走到了尽头。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从媒体的言论自由转移到网络上的信息自由, 相应被提及的一个问题是: “第四阶层”是否应该变成“第四公民”(Poitras, 2014)。

一个不均衡的全球图景

和传统新闻业一样，数字新闻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国家媒体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无法逃避国家控制之类的问题。最初，数字技术的可获得性也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它今后会成为一个议题，决定着世界各国里能出现多少对新闻的注释和贡献。

同样地，数字媒体的渗透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不均衡的，就如同印刷媒体的可行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不均衡的一样。Picard(2014)把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总结为“成熟和饱和的市场、对新闻不那么感兴趣的受众的流失、大众媒体商业模式效能的衰减、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数字竞争者的冲击”。

然而，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商协会认为印刷媒体距离消亡尚早。该组织于2014年10月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显示，世界上超过一半的成年人(约25亿人)阅读传统日报，超过8亿人阅读日报的数字版本(WAN-IFRA, 2014a)。2014年6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上半年的报纸发行量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个百分点；但在过去5年里，报纸发行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2%。如果仔细查看每个大洲的总体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报纸读者流失最集中的地区是北美洲、澳大利亚和西欧。在过去5年里，北美洲的报纸发行量下降10.25%，大洋洲的报纸发行量下降19.6%，欧洲的报纸发行量下降23%。与此同时，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报纸发行量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些数据表明，“报纸发行量持续上升的国家具备如下特征：有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相对较低的宽带普及率”。特别是小报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南非)的有文化且生活在城市的工人群体中越来越受欢迎(Wasserman, 2010)。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数字，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商协会的秘书长在一次演讲中仍给出这样的警告：“为数字新闻媒体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息息相关，还对民主社会中公共辩论的未来兴旺至关重要

要”(WAN-IFRA, 2014b)。这一警告，根植于媒体对“第四阶层”的想象，本应该在一个世纪前在美国被提出，尽管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境下。

媒体运作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环境：在大约70亿世界人口中，有60亿人口可以接触到移动电话(Wang, 2014; Franklin, 2014)。虽然移动技术的可获得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与数字网络的连接，但这些数字强调了对普遍连通的要求。

民主国家之外的新闻：对实践的研究

一直以来，在西方世界之外鲜有对新闻与民主范式的研究。为了避开这一僵局，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比对媒体系统的研究更富有成果(Josephi, 2013)。这些研究关注处于世界各地的个别记者的工作条件与感知，并确认了这一事实，即新闻工作已在全世界开展，不受政治体系的影响。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是哈尼奇的“新闻研究的多重世界”，囊括60个国家，试图对全球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文化进行概念化。正如Deuze早些时候对记者的专业认同与专业意识的再思考(2005)，Hanitzsch的调查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

对实践而不是规范的关注被看作数字新闻领域的前进之路，因为在该领域里规范抑制着采取可以挑战制度结构的任何创新。Domingo等人建议采用完全以实践为导向的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2011)。行动者网络理论非常全面地描绘了“与变化着的新闻生产有关的行动者多样性”，还描绘了新闻使用与贡献，即“人们对什么是新闻和谁有资格生产新闻的期待，……他们参与新闻生产的动机和实践，以及他们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这些研究者承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而且只能分阶段实现。但是一旦完全实现，它将有助于“对我们当代社会中新闻的角色进行再评价”(Domingo等, 2015)。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运用于全世界。数字新闻如果被视为民主发展的一个指征，很容易受到媒体系统和国家控制的限制。然而，对实

践的聚焦却能够探明在一个国家里新闻业是如何被构筑的，尽管这些发现揭示的具体实践很少满足那些已被广泛接受的规范性期待。

沟通式民主的不同模型

数字化时代评估新闻与民主之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看上去可行。三种对媒体有很强适用性的模型出现在20世纪(Benson, 2010): Walter Lippmann提出的精英主义模型、John Dewey提出的参与式模型以及在Habermas的理论中被发现的协商式模型。

精英主义模型

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转变已经重燃人们对“Lippmann-Dewey之争”的兴趣。这场争论并非真正的对话，而且在数字技术到来之际已经归于平静。Dewey在其著作中就Lippmann的观点发表评论，二人在公众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Lippmann在《公共舆论》(1922/1997)和《幻影公众》(1925)中表达了他对民主的悲观态度。在他看来，民主理论起源于对人的尊严的愿景，已经变得受制于选民的智慧和经验。Lippmann认为，刻板印象、偏见、宣传和人的自私本质，倾向于破坏这种智慧，而且很多问题已经变得太复杂，从而超出了选民的理解范围。Lippmann并不认为更好地交流国事是一个解决办法。在他看来，报纸在应对“暴力性偏见，漠不关心，对稀奇古怪的琐事的偏好，对次要事件和诸如三条腿小牛事件的渴望”此类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进展。重要的是，Lippmann要求“放弃全权公民理论”，转而把决策过程分配给专家，以便在议题出现的时候它们能够以“不仅仅是盲人冲撞”的方式被处理。新闻应该“被一个智能系统所发现，这个智能系统帮助媒体发现新闻，并且能够控制媒体”。这里的智能应该被委托给公正无私、不被自己的先入之见和个人兴趣左右的专家。不足为奇的是，Dewey把Lippmann的上述观点称为“目前被构想出的或许是对民主最有效的控告”(Steel, 1997)。

必须把Lippmann对有些愚昧的、轻易被引导的大众选民的不信任放置在极权主义政体崛起的背景中去审视。Lippmann的倾向使他不仅成为“精英民主”的倡导者，而且还是“精英媒体”的拥护者——由专家来写作，职业记者为想要被启发的公众写作。在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路径中，编辑和记者应该充当“看门人”的角色(Hermida等, 2011)。

“精英媒体”的概念让那些把自身看作记录型的报纸试图尽到其职责。它们努力印刷出“适合印刷的所有新闻”，正如纽约时报的标语所讲，包括无趣但有价值的故事，大多被刊登在报纸的偶数页上。对于一些高质量的讨论和贡献，很多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其难以理解。一些报纸炫耀它们的精英地位，用到一些口号(比如《法兰克福汇报》的“在这份报纸背后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它们还陶醉于其作为意见领袖的地位。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高质量的媒体，当下在面对一个更民主的新闻环境时不得不让自身重新合法化。

参与式模型

Dewey对这场争论的贡献在于他对Lippmann观点的评论形式，以及他自己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1927)。Schudson(2008)认为Dewey的这些评论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种友善令人惊讶，因为Dewey关于民主的概念与Lippmann大相径庭，而且现如今已成为基于互联网的参与式交流的哲学基础(Hermida等, 2011)。

Dewey为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辩护，在他看来公民参与是民主合法性的来源。他试图移除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且视个人处于其从属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网络当中。不像Lippmann不相信公众能够理性地参与民主，Dewey所推崇的观点是：人民是政治权威的来源。他被描述为20世纪的自由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参与式民主拥护者”(Westbrook, in Rogers, 2010)。对Dewey而言，政治判断的检验标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相反观点、理由和经验的

挑战(Rogers, 2010)。

Dewey的“一个参与式的媒体文化”的愿景，可能无法在20世纪实现，尽管他的概念对一些学者而言是可取的。Herbert Gans在他的《决定什么是新闻》一书中为会带来文化民主化的多视角新闻辩护(2004/1979)。Gans的这本重要著作清楚地阐明了政客、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亲密互动，在结尾处表达了对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需求：能容纳共存的种种意识形态和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能在大众媒介中被公众知悉和了解。Gans认为这“能让记者充当更加民主的公众代表”(2004)。

协商式模型

最经常与协商式模型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是Jürgen Habermas。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早于1962年在德国出版，在大约三十年后它的英文版取得了显著的地位。而他的《沟行动理论》(1981)一书则把Habermas提升到民主核心要素之一的“协商”的主要拥护者。

对Habermas而言，英格兰资本主义早期的咖啡屋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空间，位于其中的公民，通过阅读报纸上的最新消息，从而参与到关于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讨论中。这种空间既不是完全私人的领域，也不是国会大厅，但舆论却形成于其中，且基于开放的和批判式的种种协商。有人指责Habermas把18世纪还处于萌芽期的公共领域理想化了，但是根据Curran的观点，正是这个时期的公共领域“提供了民主社会中媒体角色的一个强有力且引人注目的愿景”。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及后来的《沟行动理论》中都强调了“理性”。根据Kant的观点，争论应该由理性所引导。Habermas和Lippmann都要求要有深思熟虑的推理。Dewey也相信协商是民主的沟通行动的核心之一。在给予“理性”特权这方面，Dewey和Lippmann都含蓄地拒绝接受偏见、刻板印象和其他不理智的情绪。Habermas和Lippmann知道来自个人体验的情绪化反应的缺陷。Lippmann研究战争时期的宣传，而Habermas的

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处于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度过。Dewey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认为公众就应该被允许表达他们的需求。

这些分界线延续到数字新闻时代。它们与优质报纸和通俗小报之间的分界线既相似又不同。通俗小报因为其依赖于情感、轰动效应和戏剧性情节而受到指责，但精确地讲，这种对大众知识的偏爱，对“生活体验的密实结构”的描绘，使通俗小报广受欢迎，尤其对那些感觉被“与阶级层次结构相关的精英认识论”忽视的读者(Wasserman, 2010)。

在对数字新闻的描述中也同样出现戏剧性情节、哗众取宠和情绪化这样的关键词。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散布的新闻往往具备这些要素。在Twitter上被转发的爆炸性新闻，例如恐怖主义行动、枪击或者自然灾害，是引人注目的且会引发大量的情绪反应。不能对这些推文嗤之以鼻，因为它们对公民生活是有贡献的(Sparks, 2010)。爆炸性新闻在Twitter上的即刻散布能让事件发生地和千里之外的广大公众都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新闻成了公民行动的一部分。对一个纯粹理性的争论的期望不会消失，但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一期望可能会退回到一个理想化的空间，在其中协商的践行者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

新闻的不同概念

关于新闻是什么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一类观点强调新闻的文本形式，比如Hartley认为新闻是现代性的首要意义建构领域(Hartley, 1996)；Wahl-Jorgenson和Hanitzsch认为，新闻是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之一(2009)。不同的是，Nerone把新闻看作一门学科：“新闻是一套信仰系统，决定了适合于新闻专业人士、新闻媒体和新闻体制的实践与准则”(2014)。Schudson倾向于给新闻下一个不那么宽泛的定义：“新闻是生产、传播关于当代事务的信息的商业或实践，这里的当代事务关系到公众利益和公共重要性”(2003)。数字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被积极参与的公众和学者们拿来与这些观点

进行对照，以及评估在多大程度上数字新闻满足了迄今为止被置于新闻之上的种种要求。

信息提供者

一个关于新闻具备什么功能的最新且富有争议的说法是：提供准确、可靠和相关的信息与新闻。具体实践比如新闻的采集和散布已经在数字新闻领域变得更为复杂。“此时此刻”，Domingo称之为是一个在新闻演化进程中充满着令人兴奋的不确定性的时刻(2014)，探索现今构成新闻的所有可能的主要和次要的实践，似乎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处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情形中，作为准则而经久不变的是：公众对准确性和可信性的期待。

公众“知情权”的维护者

在为言论自由而战的过程中，媒体通常将自身定位为公众“知情权”的维护者。这里的“自由”特意被用来揭露政府、官员和商人不想被注意到或者刻意隐瞒的那些事实。“看门人”的角色与调查新闻最为密切相关：将决策过程、腐败或违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在许多国家，调查新闻都被赞誉有加，人们视之为最令人崇敬的一种新闻形式，参与者往往是有经验的记者。“看门人”的角色，尽管与倡导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联系最为密切，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一致认可(Hanitzsch, 2011)。

把这一角色宣称为专业记者和传统媒体的“堡垒”越来越困难。社交媒体提供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异常行为报道给更多公众的平台，通常提供视觉材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更加复杂的故事倾向于需要资深记者的帮助，但是现在警觉的公众远远胜过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社会价值的传递者

Benedict Anderson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描述，关于阅读的“仪式”是如何被成千上万的人一天里特定的时间同时执行的，他借此安慰报纸阅读者们：“想象的世界显然根植于日常生活”(1991)。当成千上万的读者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事实集合”(Nerone, 2013)周围，

这促使共同意识和社群意识(如果不是民族意识)的形成。

这一共识模型，Hallin也做过描述(1994)，并已经消散，至少在美国和西欧是这样，尽管此概念坚持“记者向社会描述社会本身”(MEAA, 2014)。现代技术使得社区(成员因共同的兴趣或种族结合在一起)能以无数种形式进行自我想象，这与民族或地理界限无关。在其居住国被频繁边缘化的移民社群，已经在使用互联网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交、文化和信息空间，这些空间基于网络的公开发表、公开讨论和人际沟通(Georgiou, 2003)。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不断融合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是否需要一个“共同的事实集合”才能正常运转。

谁在做新闻

对于谁是记者的讨论已走向两个极端：专业化与参与。前者确保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伦理标准；后者确保包罗万象和多角度的报道，这有利于民主辩论。

新闻专业化

早在数字新闻“迫使”记者们进入反对用户生产内容和其他合作性努力的边界工作之前，新闻专业化一直就是一个尚存疑问的领域(Waisbord, 2013; Fenton, 2010; Schudson and Anderson, 2009; Domingo等, 2008; Hallin, Mancini, 2004)。专业化能被苛刻地判断为“由出版商和记者们发起的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获得社会声誉”，但它也可以被用于“在生产与众不同的形式的知识与新闻的同时，与其他领域协商边界”(Waisbord, 2013)。

Hallin和Mancini把“专业化”这个概念划分为三个方面：自主性，与众不同的专业化准则，以及公共服务的定位。因为他们只考虑民主国家，所以关于自主性的问题可能要被提及，尽管Hallin和Mancini已经做了附加说明：新闻业从来没有获得过和其他职业同等程度的自主性，而且将来也不会。

自主性也可以用来检验Bourdieu对新闻领

域的理解。对Bourdieu而言(2005),自主性的程度限制了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正是媒体机构拥有的摆脱经济和政治压力的自主性的程度,决定了记者的权威。Bourdieu有预见性地评论道:“就业的不稳定就是丧失自由”,而丧失自由则严重破坏了自主性与权威。

如今,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权威的丧失都显而易见。正如Picard指出的,数字化已经动摇了媒体的商业模式,随之而来的是新闻就业的经济基础变得不稳定。传统媒体部门的压缩,尤其在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已经导致就业朝向临时和合同类工作转变。这一状况已经催生出一类自我雇佣的“创业型记者”。

尽管明显存在“就业的不稳定”,但就全球来说,Waisbord仍然把专业化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新闻业力图行使控制权”。给“现代性最初面对的这种完全的自主性”贴上“抱残守缺”标签的同时,Waisbord认为专业化是抗衡权力的必需品。把“取之不尽的信息提炼成新闻”是记者的技能(2013)。对Waisbord而言,边界工作不得不在一个“水平和混乱的”新闻环境中持续进行;在这个环境中,聚焦新闻专业技术而非公共利益受托者模式,会有助于记者们稳固他们的地位。

新闻过程的民主化

数字新闻的生态系统已经严重挑战和破坏了新闻业的“单向”本质(Bird, 2009)。起初,记者们不大愿意与“业余者”分享他们的空间。在他们探索参与性新闻实践的过程中,Domingo等人发现,在2007年,“处于核心的新闻文化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因为记者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保留了决策的权力”。

尽管启动缓慢,这个全新的新闻生态系统一直在发展;朝向开放与公民参与的进程也在持续发展(Scott等, 2015)。参与式新闻呈现出众多形式:“受众参与主流媒体、独立新闻网站、成熟的参与性新闻网站、协作媒体网站,以及个人广播站”。受众参与主要借助于社交

媒体和微博。在开放的系统中,公民能影响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而在传统媒体中,新闻过程仍然被记者控制(Scott等, 2015)。这些发现支持Hermida等人的观点,即“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参与式新闻在将新闻过程民主化”。

记者们的边界工作和持续地宣称“要在民主国家里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二者表明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对权威的争取。很大程度上来讲,他们会由于环境所迫而不得不从事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实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工作实践比记者们自身更具有民主性。

向多视角新闻转变

新闻业的未来已经不可逆转地迁移到数字化空间中。这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充满了不确定性;重要的是,不确定性也围绕在读者和参与者周围。迄今为止,数字新闻的主要形式包括仅限于网络的在线发布,以及部分或全部在传统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在网络上的再发布。最常见的互动形式有对推文、博客以及主要以视觉素材为主的用户生成内容的回应。因此,数字新闻在新闻来源和新闻发布等领域引发了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其更接近Gans对“多视角新闻”的要求和Dewey“一个参与式的媒体文化”的愿景。

到目前为止,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是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成为24/7新闻周期的组成部分。Twitter已经成为发布突发新闻和事件后续发展的关键平台,这促使Twitter公司宣称:“如果2014年世界上发生了某件事,那么它就发生在Twitter上。”2014年, Twitter报告有2.84亿/月活跃用户和每天超过5亿条推文被发布。

尽管推文并不是新闻本身,但它们可以是新闻活动。Franklin已经观察到:“Twitter的140字符格式对通俗小报的文本压缩新闻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加入形容词“通俗小报的”是合适的。大多数推文的内容是情绪化的,而且很多是个人的反应,不管是对事故或者一个知名人物的死亡,都借助于Twitter。在政

治领域也能看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公开性”。例如，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Feinstein参议员将她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席的辩护而做出的基于事实的反驳第一时间发布在Twitter上。在这个例子中，Twitter构建了一个公共领域，以实现一个高水平的政治协商，它接近Habermasian提出的要求，即在感兴趣的参与者和拥护者面前开展一场理性的辩论。

Twitter绝不仅仅是政治和新闻精英们的交流工具，它也让新的声音出现在公民话语中。通过把讨论聚集在主题标签周围，Twitter能够与主流媒体代表进行辩论，正如发生在加拿大的“不再懈怠”(#idlenomore)抗议运动所展示的，加拿大原住民们在Twitter上发起围绕着主题标签#idlenomore的讨论，引发大众关注并且在线下组织示威游行，以抗议政府通过的C-45综合法案，该法案被认为侵犯了原住民的土地主权。在这个例子中，Twitter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一半来自非精英行动者和非主流声音(Callison, Hermida, 2015)，这表明众包(crowd sourcing)实现了之前在传统媒体中看不到的“多音性”(multi-vocality)。转发Twitter使得一群相互协作的精英们能有效地把另类的、非主流的声音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

此外，Twitter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众包(crowd sourcing)，这仍然把记者置于收集和过滤信息的中心位置，或者一个节点，但它也囊括了官方或精英资源以及另类行动者们的观点(Hermida等, 2014)。Hermida等人把Twitter描述为“记者们和行动者们共同建构新闻的平台”。他们强调说，网络化的新闻生态系统使得记者们与千里之外的信源共事成为可能，共事的方式并非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式采访模式。该环境是这样的，即“在其中，知识与专业技术是流动的、动态的和混合的”。

得与失

在《新媒体，旧新闻》一书的前言中，作为主编的Fenton提出一个仍然被热议的问题：新媒体是复兴了民主，还是扼杀了好新闻？这

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动态的、易变的情形中，学者们发现很难跟得上最新的发展变化(Domingo等, 2014; Franklin, 2014)。

下面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的得与失。不得不讲，这里讨论的很多发展变化正发生在北美和欧洲；在这些地方，印刷媒体变得支离破碎，而且新闻主要通过Twitter和互联网触及公众，尤其是年轻人。

参与与交互

Fenton主编的《新媒体，旧新闻》一书的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新闻与民主。这本书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被汇集成册的，即传统媒体虽然摇摇欲坠，却在缓慢前行。其体现了传统新闻的价值，提出新发展应该如何被评判，好像新闻仍然有机会回归到传统形式。五年后，数字新闻的分享、参与形式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问题不再是“开放、迭代的网络评论世界”是否被认为能引导新闻业达到新高度，而是现今数字化参与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公民参与。

参与是民主的核心价值，而且它已经变成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进行的新闻生产中一种显而易见的实践。很多时候，公民成为突发新闻的首要提供者，而且“这种作证功能——观察和提供事情发生的经过，正在被转移给社交媒体，并且越来越多地被普通目击者和行动者们执行”(Picard, 2014)。Dahlgren认为，参与性的媒体介入能强化民主制度，尽管我们并不能保证，基于更广价值考量的参与总会带来开明的决定。对他而言，参与不仅仅是关于在公共领域中“凸显政治上的涉入”，也是一种基于个人价值和道德观的行动。

另一方面，Peters和Witschge就如下观点提出质疑：广义上，由数字新闻带来的参与应该被等同于公民权。在他们看来，“参与到新闻中”而不是“通过新闻来参与”缩小了新闻在公民社会中民主功能的逻辑论证范围，并且用“政治参与的高度个人化概念”取而代之。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警告说，在评估数字新闻

的民主功能可见性时，不能简单地用“参与范式”来取代“民主范式”。在一项聚焦受众的研究中，Carpentier给出了类似的警告：不能在理论上孤立“参与”这个概念，因为这无法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中衡量“参与的相关性、重要性和被理解的程度”。

关于“参与”，记住如下观点很重要：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大众媒体逻辑仍然充当着普通民众与政治过程之间的桥梁，但参与式实践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规范。新闻生产的参与式模式让媒体明显更接近Habermasian所言的“作为民意工具的媒体”。在实际中，数字新闻是否会被公众以这种方式所感知，还是未知数。依据Dewey关于民主的观点，协商的渠道比以前更加开放，不过这些互换(思想、信息等)的质量仍需要接受大众的监督。

理性与情感

传统新闻范式非常重视理性的思考。Lippmann和Habermasian在他们对民主与传播行动的概述中都赋予理性以核心价值。Schudson称赞Lippmann是“客观性理想最睿智、最强势的代言人”。客观与中立仍然是新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历史上它们并不一直如此，而且也并非在所有的文化里都享有这等重视(Waisbord, 2013; Hallin, Mancini, 2004)。

互联网的开放接入不再过滤掉那些Lippmann试图抵制的情绪，按照其关于民主和媒体的精英主义观点，偏见、刻板印象和情绪化的辩论都是需要被抵制的。网络上，严格的把关过程的移除使得这些再次进入公共话语当中(Witschge, 2007)。其他学者已经提出，偏见、刻板印象和情绪化的辩论一直都存在。“在分离理性与情感，信息与娱乐，真实的与想象的，事实与故事上，新闻事业从未成功过”(Hartley, 1996)。

与高端报纸不同的是，通俗小报从来不羞耻于助长偏见，煽动情绪，制造娱乐性，旨在获得读者的注意力。读者喜欢通俗小报，其相当可观的发行量可以证明这一点；读者对通俗小报的喜爱也含蓄地表明，高端报纸面向精英人群，同时

也把普通人排除在外(Wasserman, 2010)。

尽管在线参与的包容性仍然有待讨论，但很清楚的是，通俗新闻暗示的很多趋势已经进入数字新闻领域，尤其当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时。频繁发送的充满情绪的讯息或推文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且能被直接地回应。看看那些网站(例如BuzzFeed)就能轻易发现，它们都体现出通俗小报的特点。新闻仅仅是包含生活方式、娱乐和体育比赛结果在内的一揽子内容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网站不提供深度报道或者常见于传统媒体的情境化文章(Fink, Schudson, 2013)，但它们能以与通俗新闻同样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它们吸引大量公众，它们发布的文章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它们的情感投入能渗透到公共领域当中(Ornebring, Jonsson, 2007)。

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的人际传播所具有的主观性必然会影响(美国人的)客观性理想。Domingo等人发现，客观性“似乎被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参与者们视为一个神话”。他们认为，透明性的固定程序取代了客观性的固定程序，尽管这不能解释所有网上的行动派新闻活动。“假设行动主义没有推动或间接引起暴力的发生，”Dahlgren写道，它“不应该被视为标志着在不同公共领域中协商式民主失败的消极之物”。然而，Domingo等人也指出，公民和读者对信息、记者的可信度有着规范性的期待，力图强调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对准确与平衡的追求。

社会凝聚力与趋势

传统媒体承诺要呈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与价值”(Hutchins Commission, 1947)。数字新闻，虽然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协同合作，但其所依托的平台不具备同样的责任与义务。

因大众媒体机构具有的商业性质，其一直被诟病，其口头上服务于新闻价值和民主国家里的新闻角色，实际上对利润趋之若鹜。社交媒体并不是中立的平台。正如Poell和van Dijck所论证的，社交媒体正在执行下面这一商业策略，即将“新的技术-商业机制引入公共传播，这强化而非中立化大众媒体”。商业策略的一

部分是算法编码，将用户参与程度最大化，并且增加网站流量。出于这个目的，Facebook和Twitter优先发布突发新闻和呈现快速变化趋势的报道，而对于那些带有频繁被使用标签的话题，比如#OccupyWallstreet(占领华尔街)，流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突发新闻或大众可参与的新闻所享有的这种优先权意味着，复杂的且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有结果的政治议题，或许很难引起用户的注意，又或者根本不会被传播。Poell和van Dijck得出结论，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破坏了新闻实现其主要民主功能的能力，这里的民主功能包括让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以及为明智的公共辩论提供便利”。在那些呈现明显变化趋势的话题中被表达的集体性，常常是短暂的，且易被公众的好奇心所煽动。因此，这种集体性被认为与传统媒体提供的社会联结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导向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而非公众的利益(public's interest)。

不同新闻形式的融合

数字媒体环境的到来已经唤起了许多关于未来新闻可能具备或缺乏的主要特点的猜测。

“Twitter革命，如果确实存在，”Nerone认为，“不大可能成为新规范结构或者一个新的居支配地位的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因为Twitter并没有以与传统日报同样的方式激起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有各种各样的线索支持Nerone的即兴评论。一个线索是，新闻规范理论的适用范围非常小。规范理论是针对数字新闻而被发展出来的，尽管数字新闻的传播更为广泛，但是规范理论可能来自一个同样暂时性的且受制于空间的境况。成熟的民主制度并非全球性的标准，应避免将在西方提出来的理论运用于世界其他地方。事实上，一直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民主的中心性，即应该谨慎对待任何未来的理论(规范性的或者其他)。参与式新闻的视野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认识其技术上的，以及实际参与中的全部潜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能被观察到的合作新闻的种种瞬间让人想起Habermasian提出的萌芽期的公共领域，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直到被不同的发展所取代。这些不同的发展中有一些已经被观察到，比如对参与的商业性开发与利用。实现参与的赋权，是以用户行为被追踪、集合和挖掘为代价的。连接性媒体的生态系统依旧受制于商业规则，它们的运行方式比老式媒体更具侵入性，因为它们把用户活动与广告商联系在一起，采用的是“深度个人化和网络化定制”的机制(van Dijck, Poell, 2013)。

出现在Nerone的评论中的第二个线索，集中在“支配的”这个形容词上。“参与的”和“支配的”不一定相互矛盾，“参与”这个概念总是与“支配”和“霸权”这两个概念难舍难分。迄今为止，新闻工作的参与式形式，不管是通过发布评论，故事输入，还是成为一个新闻源，都远远不是支配性的。新闻媒体组织“仍然生产着我们今天消费的大多数新闻，甚至是那些通过社交媒体和整合者们进行传播的新闻(也来自新闻媒体组织)”(Domingo等, 2014)。新闻的这种制度形式，基于共同的信仰系统、结构、标准化的实践和规范(Picard, 2014)，是由那些会继续在新闻价值与故事创作方面坚持专业性的记者们所创造的(Waisbord, 2013)。

我们不仅有两个平行的新闻世界——一个是传统的，扎根于大众媒体逻辑，另一个是数字化的，开创了有待进一步成熟的参与形式；我们还有这样的预言，即新闻的公共机构性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消除。至少记者中的一部分可能要为“少数几个大型综合商业化新闻提供商工作，这些提供商会控制大多数国家里的数字化新闻供给”(Picard, 2014)。

在民主国家里，制度化的新闻业把自己想象成支撑民主的四大支柱之一，数字新闻则带来参与的多种可能性，提供多元视角，并且让公众产生情感投入。这二者的融合会确保民主价值得到维护，协商持续进行，非民主国家也会见证这样的融合成果。